

【电影史·媒介考古专题】

近代中国启蒙视阈下的 媒介变革与知识传播

——以白话报、广播、电影为中心

张 晶 朱时宇

【摘 要】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需要跨越文字造成的知识壁垒,向不识字的民众传播现代知识。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在全国各地创办白话报,试图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开始发掘广播与电影的教育功能。前者通过声音传播,后者通过影像传播,使知识精英能够绕过文字教育的阶段,直接向民众传播知识。20世纪上半叶,在救亡的压力之下,普及知识成为启蒙运动的优先目标。各种媒介不断被用于启蒙教育的过程,亦是知识精英不断向民众靠拢的过程。

【关键词】知识精英;电影史;教育史;启蒙教育;知识传播

【作者简介】张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朱时宇,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9.90~99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近代江苏媒介变革与信息传播(1872-1937)”(项目编号:2023SJYB0025)的阶段成果。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精英始终致力于开展启蒙运动,力图在学校教育之外,对广大民众进行教育,以使民众掌握现代知识。这一时期,亦是各种新兴媒介由西方传入,并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晚清时期报纸在中国出现,用于传播信息;20世纪20年代广播在中国出现,被认为是一种娱乐工具,兼有信息传播的功能;20世纪初,电影在中国出现,亦被视为是一种娱乐消遣。然而,新兴媒介的发展引起了知识精英的广泛关注,知识精英意识到媒介可用于进行社会教育,为启蒙运动服务。由此对于新兴媒介的功能认知经历了一个教育“转向”的过程,在知识精英眼中,媒介不再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不应成为娱乐的工具,而应该是教育的工具。这是近代教育史与媒介思想史中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

新兴媒介被用于启蒙教育并非个案,而是近代中国几乎所有媒介的共同趋势。若对多种媒介进行综合性研究,当能对这一趋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已有研究大多注意到某种媒介在近代教育中的运用问题,例如白话报、广播等,但对多种媒介进行的综合性考察尚不多见。

近代以来,中国文盲所占比例极高,文字成为社会启蒙的重要障碍。传统士阶层利用文字形成了对知识的垄断,造成了相对于不识字者的知识壁垒。如何跨过识字者与不识字者之间的知识鸿沟,成为知识精英在社会启蒙中思考的重要问题。白话报、广播、电影都是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兴媒介,且都被知识精英视为启蒙教育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本文拟选取这三种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思想史路径探究知识精英如何认识这些媒介的教育作

用,这些媒介在教育中各自具有怎样的优势,以及在实际运用中这些媒介存在怎样的局限。

一、白话报:语言文字的改良与局限

在传播知识的各种方式中,以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最为常见。各种教育机构中的教学与社会上的演讲均属于口语传播的方式。但到清末,知识精英已经不满足于仅使用口语传播的方式传播知识,报纸成为知识精英新的选择。

报纸承载的所有信息几乎都带有开民智的作用。丁国珍认为一些政治新闻,“如两宫还海、圣驾游湖、堂官到任、大员来京,种种官场记事,使中国百姓知道中国官场的事”,可以起到开通民智的作用。民生新闻同样可以教化民众,诸如“婆媳打架呢,我们劝他和睦。弟兄纷争呢,我们劝他宽忍。孩童走失呢,我们劝人民留神。学徒被骗呢,我们劝铺商小心”^[1]。所谓开通民智不仅要求知识精英传播知识,还需要传播信息,以打破闭塞的环境,解放民众的思想。因而在启蒙运动中,新闻亦被纳入“知识”体系,成为广义上“知识”概念的组成部分。

报纸的目标受众理应是全体民众。但在甲午战争以前,报纸的发行局限于读书人内部。以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言,报纸的读者仅有士阶层。在有识之士看来,报纸应当是为所有民众服务的,信息亦不能由士阶层垄断。清末,有知识精英在劝说民众看报时说道:

当下无论士农工商,大家皆应当看报,做官的更当看报,就比方报馆访事的,知道某人为非,于良民有害,这官要是差衙役拿他来,才能够不屈他呢,这不是做官看报的好处吗?要是不看报,那里知道呢?再说读书的看报,凡未到的事,报纸预先议论,也增长见识。还有一种学报,内中有各种的科学,也可实用。庄稼人也当看报,有农学报,还有农画报,新近美国有一位农学家,配了一种新肥料,种地的能够买来,试验,试验,还愁庄稼收的不好吗?就是工人也当看报,也可以知道某工厂,某工师的手艺高,不由的工人也有竞争的思想,日后还愁制造不精吗?这商人更当看报,就比方地面银钱的行情,不出

屋门就能知道,各省丰收贱年,也没有不登报的,货物价钱大小,某处土货成色高低,可办不可办,可销不可销,一目了然,不比问人强吗?^[2]

士农工商都可以从报纸上获得信息,学到与自己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报纸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传播知识。

晚清时期,中国已有多多种报纸发行,但总体而言报纸发行量较为有限。甲午战争后,《时务报》风行一时,在全国引发极大反响。然而,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裘廷梁在致函《时务报》创办人汪康年时分析说,当时《时务报》“每期销至万四千册,可谓多矣,然犹不逮中国民数万分之一”。在裘廷梁的家乡江苏无锡,“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推之沿海各行省,度不甚相远。其力足以购报,才足以阅报者,罔不购阅之矣,自今以往,阅报之人所增无几矣”^[3]。裘廷梁观察到《时务报》的读者主要是士阶层,读者数量已经达到极限,今后难以再大幅增长。如果将中日两国的报纸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报纸的发行量存在不小的差距。19世纪末,按照康有为门生陈荣衮的统计,日本当时虽然面积仅相当于中国的四川省,人口仅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乃合计全国报馆,闻有八百余所,即佛门之报亦十余家。大阪朝日报,每日出新十万有多。而我国报馆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上海某报,闻每日出新八九千之间,自以为雄视一方矣,然亦不及大阪朝日报十分之一”。陈氏称其在日本时,“见路旁之车夫,旅舍之婢子,各执报纸,喃喃讽诵。若夫佣工,每月得工金三圆者,竟阅报至三份之多。而回顾中国即如广东省城,一店之中识字者仅有数人,以省城内外十万间之店折半而计,亦应销报五万”,然而实际上广州报纸的销量远未达5万份。^[4]

时人认为报纸是开启民智最为重要的媒介,但中国的报业并不发达,根源就在于报纸使用文言文,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学者刘师培指出:“中国自古代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同。”若想挽救这一弊端,必须使用白话文。刘师培认为

中国的报纸发行量少,并非国民不爱看报,而是因为既有报纸“皆用文言,仅适于学士大夫之目,而不适于农工隶卒之目也”。报纸使用文言文,造成了士阶层对于知识信息的垄断,而使农工商等社会群体仍处于愚昧闭塞的状态。趋新的知识精英中持此看法者不在少数。刘师培为此发出质问,中国民众“号四百兆,而农工隶卒之数,倍于学士大夫。今聚四百兆之民,而受报界之影响者,仅及于上流社会,何其与文明普及之旨相背与?”^[5]除因报纸使用文言文以外,购买报纸所需费用同样限制了读者数量。在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多数民众难以承担或不愿承担购买报纸的费用。

为扩大读者数量,清末民初全国出现一股办白话报的热潮。白话报办报人追求言文合一,目标是使识字者皆能看懂报纸,重点是将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民众纳入报纸读者范畴。有知识精英对于白话报的前景做过设想。在他看来,白话报“个个都可看得,稍识了几个字,固然可以阅看,就是那目不识丁的人,叫他去看,也很容易的。只消读三五个月书,识几千字,大概就可以成功,不必三年五年了”^[6]。此外,为解决费用问题对读者阅报造成的阻碍,清末各个城市的知识精英自发成立了阅报处等公共阅报机构,或设立贴报牌,免费供民众阅读。

在清末的白话报热潮中,甚至一些边疆地区亦准备创办白话报。在论述创办白话报的理由时,一些地方官绅不约而同地提及知识传播的效率问题。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在解释其创办白话报的原因时指出,开通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与其开导以唇舌实难家喻而户晓,不如启发以俗语,自可默化于无形”^[7]。“开导以唇舌”难以收“家喻户晓”的普及效果,而白话报却可以大大提升传播的广度。广西教育总会的黎康祺等人认为,广西建立的宣讲所由于经费有限,“仅聘宣讲员三人,似觉范围太狭,难收普及之效。拟请创办白话日报,以辅宣讲所不及”^[8]。广西的知识精英同样注意到报纸在普及知识方面的优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白话报,依然具有阅读

“门槛”,它要求阅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字能力。从清末至民国时期,这一阅读“门槛”严重限制了白话报传播知识的效果。因此,白话报必须与其他教育手段或传播路径相结合,使不识字的民众跨越文字所形成的知识壁垒,才能更好地发挥知识启蒙的作用。陈荣衮认为中国识字人口太少,“虽以浅说作报,亦未能大开民智者,则多开小学堂,多求训蒙捷法可矣”^[9]。小学堂或一些民间自发创办的教育机构可以进行短期的识字教育。“每天叫他们念几行书,写几张字,看些白话报,不必教他们别的,只教国文一项,这样做下去,三五个月就可见速效了。”^[10]但即使是这种短期教育亦需要耗费时间精力,民众未必愿意参加。知识精英更多是通过讲报或演说的方式,将报纸与口头传播相结合,使不识字的民众能及时接收知识信息。例如清末北京即设有多处讲报社^[11],还有茶馆兼有讲报服务,一些说书艺人亦以白话报为主要材料开展讲报活动。^[12]

演说则被知识精英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演说与白话报成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演说可以使不识字者接受知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报纸传播,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学堂收效最迟,报章仅及士流,演说则无智愚贤不肖,皆能感动”。由于识字人数有限,报纸的受众是有限的,即使是白话报亦不能被社会上多数民众阅读。“普通社会之人,识字者什不得一,白话报纸之在社会得其一而失其九,遗憾犹多,济白话之穷,舍演说莫为力也。演说者,又白话之先锋也。”^[13]另一方面,白话报打破了演说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可以为演说提供素材。演说虽然跨越了文字障碍,但是这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传播范围方面极为有限。《中国白话报》创办人林懈在解释其办报原因时,称其如果在上海说话,“那能够教十八省的人都听得着,我又没有加响的喉咙”^[14],因而借白话报扩大传播范围。刘师培亦指出,中国近代以来演说渐趋流行,但各省方言差异极大,“且演说之设,仅可收效于一乡,难以推行于极远。是演说之用,有时而穷。若白话报之设,虽与演说差殊,然收效则一”^[15]。白话报实现了言文合一,各地演说者可

以直接将白话报内容作为演说素材加以利用。如《福建白话报》创办后,福建有致力于社会教育的民间社团“专采此报论说以为宣讲”^[16]。

清末至民国初期,是白话报发展的高峰。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有评论批评道,新文化运动“完全是贵族式的,平民没有得着一些益处”^[17]。这一评价虽有偏颇之处,但道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实情。这一时期,白话报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能深入乡村地区。1927年以后,白话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内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有所倒退。1935年时,有人感慨“现在的报纸,一个在初等小学的学生就看不懂”。甚至到了民国末期,知识界再次出现了将白话文入报的倡议。^[18]在20世纪30年代,北平、天津等城市仍设有阅报所与宣讲所,由政府派专人宣讲,但是听众稀少,“只有负贩拉车及游手好闲之流,或利其有炉火茶水,可资休息,始入室暂坐,而未必尽为听讲求知以去矣”^[19]。这样的阅报与宣讲已是流于形式。

文字形成的知识壁垒是近代知识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白话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知识精英的努力方向。即变革报纸用语,打破知识精英对于知识的垄断权力,将知识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但白话报仍无法跨越文字障碍,这一障碍只能通过报纸与读报、讲报、演讲等口语传播方式相结合才能跨越。因此,知识通过白话报向不识字民众的传播实际上高度依赖口语传播这一中间环节。但是口语传播本身存在诸多弱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口语传播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播效率极低。由此形成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知识精英为提升知识传播效率,扩大知识传播范围,而在口语传播之外积极倡导白话报,但白话报要扩大传播范围,又不得不依赖口语传播。知识精英借助白话报向知识普及化的方向迈出一步,但从传播效率而言,白话报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并不能使知识精英满意。

二、广播:声音传播的“无远弗届”

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加剧了政学两界精英

的焦虑情绪。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委汪怡认为:“现在比从前不同,现在是跟东西洋各国并立在世界之上,非国民一齐具有立国的能力,绝对是站不住的。”“因此,我们识字的人们,总得替那些不识字的想法,求他们也同我们一样能够识字看书才好。”^[20]而广播为知识精英的启蒙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无线电专业人士以外,广播的教育功能并未引起知识界太多的注意。但当时在一些广播较为发达的国家,广播的教育功能不仅被充分认可,而且已在付诸实践。例如在英格兰,“广播已几乎完全被当作一种进行大众教育、启蒙与娱乐的有效方式”。当时英国广播公司(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所播节目中,文化节目已经占有重要地位。^[21]知识精英对广播的相对忽视,是因为此前中国广播业本身发展规模有限。整个20世纪20年代,广播被定位为一种娱乐工具,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收音机仅是一种昂贵而稀有的“新奇玩品,供一般有闲阶级,酒后茶余消遣之工具而已”^[22]。

20世纪30年代中国广播业的迅速发展,终于使知识精英意识到广播在教育上的巨大潜力。首先,广播如果用于教育,其受众覆盖范围广大。此前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但印刷媒介本身流通范围有限,在交通不便地区以及乡村地区不容易获取,“至播音教育则借无线电机以传播各种知识,凡设有收音机之处,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无论公共机关或私人住宅,亦无论识字与不识字之人,皆可听讲;故其收效之宏,尤在印刷品之上也”^[23]。向不识字的民众传播知识这一启蒙教育难题获得了新的解决方法。在公共场合设置的收音机“如用扩大器,则更不为地址或场所之所拘束。故其效能所及,尤为普遍”。不同媒介所需费用的差异亦对受众数量产生影响。“书籍报章,必须化(花)费相当之代价,方可购阅,又非一班民众所能人人皆备;而广播仅须于公共场所装设收音机一具,虽数百人均可收听。”^[24]且这种集体收听并不局限于一地,而是

只要有公共收音机的地方皆可集体收听,其传播范围自然非演讲等口语传播方式可比。

其次,广播大大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报刊书籍等印刷媒介“均须经过排版印刷或抄写之阶段,故在时间上牺牲极多。广播则立谈之间,所言所论,可以达于各地:无排版印刷或抄写之繁,而收迅速敏捷之效。且不拘昼夜,不论年月,均可播送”^[25]。

最后,广播的教育不受时间限制。广播为民众提供了一个随时可以受到教育的环境。只要广播电台“使播音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那么,播音台上,长年累月的在播音,也就是长年累月的在供给民众教育的机会。这种教育机会,都密密的伺候在民众周围,只待他们有暇听无线电时,教化作用,便能长驱直入”^[26]。广播播出的时间较长,为听众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收听时间。

利用广播进行教育尤为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教育家杜元载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其原因固由于国民经济的的不平等,但教者的口讲指画,发行讲义,究所及有限”^[27]。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中国的教育普及率极低,到20世纪30年代,“国人得受初等教育者,百不得三,得受中等以上之教育者百不得一”,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28]教育普及率低,导致文盲仍占据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一百个人中,大约只有十五个人识字,不识字的,占了百分之八十五。这些大多数的文盲,不识字,不能看书,就把得到知识的道路塞断了。如果要他们识起字来,那么至少要费二三个月工夫;否则有个简法,就是在无线电播音中,去听各种灌输知识的演讲。无线电收音机,是不识字人的书本,就是瞎子也不妨,只消耳朵不聋就行”^[29]。广播可以使不识字的民众绕过识字教育阶段而直接获得知识,则受教育者范围大大增加。

由于广播在传播的广度与速度上具有当时其他媒介难以企及的优势,可以增加知识传播的效率,知识精英及广播从业人员都将广播视为教育工具。有知识精英认为国家“欲于短期间内遍设教育机关,于财力与人力两方面,皆感极大困难,惟有凭借无线电

的力量,广播各种教育节目,以增进民众知识,使成为智力兼全,刚毅勇敢之国民”^[30]。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副处长吴道一认为:“我国教育之不普及,文化之落后,尽人皆知,但在国库空虚,农村破产之时,吾人只有利用广播电台,作教育之工具,盖广播电台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确是现代最新式之教育工具,较之任何阶段教育的施教方式,均较为简便,而所得效果亦较为宏大”^[31]。教育部官员亦认定:“收音是一种教育工具,不纯在娱乐。”^[32]

广播中的教育节目一般被称为播音教育。有人将播音教育比喻为“空中学校”,因为广播可以如学校一样对失学青年与民众进行教育。即使对于中小学校而言,如果能装设收音机安排学生收听,教师在旁辅助讲解,学生可以“于各科正课之外,更获得有系统之补充知识”,“则学生知能之赖以进展者,其量当亦不鲜”^[33]。尽管从教育学角度看,播音教育亦有其严重缺陷,例如授课时师生无法互动,教学效果难以检测、教材讲义难以统一等。但对于当时初等教育不甚发达的中国而言,知识精英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在短时间内提高教育的普及程度,教学质量问题还在其次。播音教育可以极大地节省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自然受到知识精英的格外重视。

时人甚至认为“今后播音教育,实可取学校教育而代之。大学和中学的教育,都可用广播教授,以普及于大众,使有志向学之士,无条件的享受机会平等的教育,而毫无限制”^[34]。播音教育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除有识字、国语、外语等基本语言类教育外,还包括“生活所需的基本常识,不论在卫生方面,公民方面,史地方面,自然方面以及其他各项重要材料的灌输”^[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精英几乎一致强调民族思想在播音教育中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利用播音教育“巩固统一的基础”“养成民族的自尊”“讲述国权的损失”“传达国际的情况”^[36]。

按照知识精英的设想,广播的教育作用不能仅仅体现在播音教育节目中,且应使所有节目从广义

上来说均带有教育意义。教育部官员陈礼江意识到,“集中的教育意味的材料,终是苦口的良药,并不能合多数人的口味,多遭受拒绝。所以,我们利用播音来教育一般民众,不应仅限之于集中的教育材料,同时,更要把教育的成分,分布在各种播音材料中,使一切的播音,都从教育的观点出发,都具有教育的作用”,使得收听广播能获得教育的效果。^[37]

但知识精英的设想很有可能招致听众的抵触。有署名“家千”者就担心利用广播普及教育有些操之过急,城市中的多数听众是为更方便地享受娱乐而购置收音机,如果广播中教育节目过多会失去听众,听众不可能“放弃了弦子琵琶而像做小学生似的在收音机旁上课,即使电台上百分之百播送了教育节目”,恐怕听众的收音机“都要束之高阁”,然后前往娱乐场所继续享乐。^[38]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曾有不少听众致信中央广播电台,表示拒绝收听教育节目,要求增加平剧(即京剧)等娱乐节目。^[39]甚至有知识精英无奈之下直接发出呼吁,“我们要诚恳地告诉以收音机为娱乐的听众们: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政府拿出巨资来创造广播电台,当然是绝对不是专为放送娱乐节目——音乐节目以供闲情逸致的消遣而设,所以我们很希望听众们不要慷慨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听众们的放弃,未始不是国家的损失,反之,听众们的得到的权利,那也未始不是国家的收获”^[40]。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济于事。

为使听众乐于收听和接受教育,知识界和中广处提出了“寓教育于娱乐”的方针。有舆论认为“倘能于娱乐之中,寓教育之义”,在娱乐节目中加入教育意义,则可以“激励听众之爱国思想于不知不觉之中”^[41]。中广处传音科科长范本中亦认为最理想的广播节目“乃是娱乐与教育混而为一。换句话说,我们要娱乐中有教育,教育中有娱乐”^[42]。中广处进一步解释称:广播“绝对不是一种娱乐的工具,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借音乐而吸引听众,调剂精神,这是一种施教的策略”,广播节目不能没有教育意义,“如果离开了教育,根本便谈不上播音”^[43]。但是节目制作

者为“吸引大多数听众常来收听中央电台,以求不断的灌输一点国家民族意识,而在紧要时期可以达到宣传的希望,那末(么)日常节目,必须要使得它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兴趣才成。那只有在娱乐节目方面努力发展而充实其内容了”。广播“可以不断的供给一般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者的精神安慰。这种精神安慰,使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听到一两句或者感悟到一二点,在他们的身心上起了作用。这种作用,大都在娱乐节目中容易获得,那末(么),这就是教育了”^[44]。

知识精英利用广播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初等教育的民众。范本中指出,知识精英“哪里还需要播音教育,他们可以自由地看书看报,可以上图书馆”。“而中国大多数的群众是连普通常识都没有具备的文盲呀!他们是需要听教育节目的,那末(么)无论报告也好,演讲也好,教育也好,担任讲的,应该先在传声器前闭着眼想一想,围绕在那边收音机前后的听众,并不是中学生、大学生,而是一般知识浅薄的群众,应该如何用浅显的譬喻,详细的解释,反复的申诉来广播给他们听。”范氏“更希望各电台于播音对象,以后要多多注意到浅的方面去,替他们谋知识的进步”^[45]。由此可见,知识精英将广播定位为现代教育工具,并试图垄断广播以教育民众,这实际上是近代以来启蒙教育活动的传承和延续。

从理论上,广播以声音传播知识,能够实现对广大民众的教育。但这一媒介的知识传播若要实现普及,需以收音机的普及作为前提。遗憾的是,民国时期收音机始终未能实现普及,且分布极不均衡。全面抗战以前,国民政府估计全国收音机最多时达到100万台。^[46]但这些收音机主要分布在东南省份及少数大城市中。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计划全国每个县市至少设置一台公共收音机^[47],然而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设立的公共收音机仅有1200余台。^[48]抗战胜利后,除上海、台湾地区收音机数量较多外,其余地

区收音机极为罕见。如到1946年时,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全市仅有150余台收音机。^[49]即使每一县市设立一台公共收音机,其所接收的知识信息还是需要由收音员或当地报社接收,再以宣讲、壁报、传单、报纸等形式进行二次传播。收音机的不普及大大影响了广播的传播效率。

三、电影:影像传播的知识赋魅

20世纪初,电影已在中国出现,社会各界长期以来仅将看电影视为一种娱乐方式。20世纪20至30年代,电影在欧美国家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学两界才意识到电影对于民众教育的重要意义,开始大力提倡教育电影。有知识精英指出,将电影只看作娱乐品是一种错误认识,应“恢复它原有的功能,仍把它利用来,作成教育推行的良好工具,以谋发展中国的社会教育”。电影用于民众教育,“不但能调和民众身心,增广民众知识,更能使民众明了国际情形,唤醒民族意识,使国家发扬光大。”因此电影是“现代社会文化的源泉,推行民众教育的利器”^[50]。有从事教育者指出:“因为教育电影的内容,所包括各种的科学,范围很广,搜罗丰富,可以令人自由求教,而它的施教对象,不分男女老幼程度的高低,它的对象是全民的,不管任何人,都能够享受教育均等的机会,而得到生活上思想上各种的新智识”,所以电影“确为推行民众教育之利器!”^[51]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更是提出,“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享乐的时候了,当然不需要那些仅仅含有浪漫性颓唐性的娱乐电影,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含有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之教育宣传影片”^[52]。知识精英提倡将电影应用于教育,不仅是受到欧美国家教育电影的启发,亦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与社会教育或通俗演讲等口语传播方式相比,电影在传播知识的效率方面显然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教育“收效太慢了,而且有多数人无此闲暇”;通俗演讲又“太抽象,无兴味,而且听者不容易了解讲演的内容”^[53]。中国不识字的大众人数众多,各地区

之间语言差异极大,“所以要实施社会教育效率增大,惟有把电影来做工具”^[54]。且社会教育的施教范围是有限的。1927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建立民众教育馆,对不识字的民众与失学青年进行启蒙教育。但有社会教育从业者表示:一般的民众教育馆“其直接施教区大概不出数里方圆,即推广区亦总在一二十里之内。在此区域以外的民众,我们既鞭长莫及,要他们自动前来就教,更属不可能”。由于民众教育馆缺乏经费,导致组织不健全,施教对象范围又有局限性,“欲于短时间内普及全民实为妄想”。电影则有望弥补民众教育馆的不足。电影可以在固定场所放映,例如“在一广大场所可容纳千人(即在较小场所亦可容纳数百人)此乃系一次计算,如一天当中开映三次或五次,依次递加”,那么受到电影教育者为数十分可观。^[55]电影若是通过巡回放映的方式,可以深入乡村地区。“从甲地至乙地,从乙地至丙地,如此轮回开映,各地民众,皆蒙其利,而在实施者,并无多所耗费。”^[56]“而小型放映机与移动发电机等轻便工具,又应此需要而产生,故今日之电影教育,不论穷乡僻壤,无远弗届,个个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是民众不能前来就我,我即移以就彼。”^[57]电影跳出了学校的空间限制,对于社会教育意义重大。“映放电影的场所,就是实施国民教育或社会教育的场所,银幕就是讲台”^[58],教育的空间大大拓展。电影的巡回放映“更可吸引异地的群众在同一意识的启示下,这对于沟通各地群众的生活习惯,联络各地群众的感情,又著有特殊的效能的”^[59]。观众不需要识字亦可看懂电影内容,因而电影与广播一样,都可以绕过识字教育阶段,直接向民众传播知识。对于不愿受教育的民众,知识精英亦可以借助电影这一民众乐于接受的媒介,使民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与报纸、广播等媒介相比,电影以影像传播知识的方式同样具有优势。“教育原是使人理解的一种方法,理解是因接触外界的事象而起的一种感觉,所以外界的事象愈具体,愈容易感觉容易理解。”在人类

的各项感官中,以视觉最为发达。“因视觉而起的直观,是最最快最容易理解的。”电影以影像呈现知识,“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束缚,无论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奇景,它都能一一演述说明”。这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报纸与广播“是赖言语和文字作媒介而引起来的一种想象。理解的效力,决没有电影那样的明澈完备”^[60]。教育电影经过知识精英有意识的编辑,“是具体的而不是概念的,是连贯的而不是孤立的,只须稍加辅助讲解,民众便能在缺乏联念的脑海中而自行组织起来”^[61]。电影相较于语言文字,留给民众的印象更为深刻,不容易遗忘。

电影的优势主要有三:一是节省经费。“影片一套之价,廉于一演讲员之月费。”^[62]当时中国的教育经费极为匮乏,导致各类学校师资普遍不足,“对于小学,尤其是民众学校的师资训练,已经感到极大的困难。推行电影教育,不独可以澈(彻)底的统一教育的方针,补救师资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一部分教育经费的艰窘,实在是贫穷的我国普及教育的最经济最有效果的办法”^[63]。且教育电影由国家提供,可以取得全国教育统一化的效果。

二是节省时间。学校教育与演讲所费时间往往比教育电影要长,例如教师讲到人体血液循环的原理时,演讲至少需要30分钟,而电影展示只需5分钟。很多科学原理仅用语言文字难以解释清楚,必须借助图像或影像,“如电话之原理,亦可用画制为影片,凡物理学上之原则,平常用口说每致枯索无味者,皆可用影片以代之,如声浪之传布,光波之曲折,磁极之方向等等,皆可赖影片之力而收通俗教育之功也”^[64]。

三是以视觉呈现吸引观众兴趣。民众对于学校教育与电影的态度差异极大。在浙江衢州的数个民众学校中,每个学校仅有十几个甚至七八个学生,“举行什么比赛或召集什么纪念会,先之以宣传,继之以劝导,而其结果,民众未必踊跃参加”。但是当电影教育巡回队到衢州放映电影时,甚至无需动员,

“没有一次不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65]。这一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民众“大概有不爱听宣讲的,有不爱听戏的,有不爱听书的,没有不爱看电影的,并且妇人小儿,尤其的爱看”^[66],显示出电影对于民众的强烈吸引力。

电影虽然能够吸引民众,但如何利用电影实施教育仍需要讲究技巧。有署名为“伯宁”者发现学校中放映的教育电影受到学生们的厌弃。“伯宁”仔细研究后发现学校放映的教育电影“用意虽好,可惜太呆板,太无变化,太不合观众的心理,于是变成了一部活动的教科书了,无怪青年们见了要摇头”^[67]。学生尚且对这种教育电影没有观看的兴趣,遑论普通民众。

由于民众的知识水平较低,知识精英在利用电影进行教育时,亦要强调趣味性。含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应该要像小说一样,使人看得很有系统留恋不舍。例如历史,地理决不能映一个人形,或是呆板的地图就算,应当把它编成很精巧的剧本,才使人看得有兴趣”。为提升教育的效率,电影还可以配上说明书。“说明书要用通俗的话编成,作为观众的课本,一方面读,一方面看。”^[68]影像与文字结合,进一步便于观众理解,加深民众对于知识的印象。对于电影中教育与趣味的关系,电影教育家戴公亮提出一种设想:“教育电影应该是以积极的教育为经、以趣味的故事为纬而组织成功的。它的演出因为是通俗的、有趣的娱乐,所以能够吸引观众,并且还有种维持观众观看的力量,使他看了再要看。”电影的最终落脚点是实现对观众的教育。教育电影包含的范围十分广阔,除了专门用于教育的影片外,“一切娱乐影片,如果在摄制上加以教育的设计,而能够发挥出正面的、积极的教育作用来的,都可以称做教育电影”。换言之,在知识精英的理想中,所有影片都应属于教育电影。所以电影中教育与娱乐“并不是敌对的,而是可以互相容纳的”,“乡村用的影片因为人民的智识程度较低,娱乐的因子应当通俗而广阔;反之,城市用的影片,应该减少娱乐的因子,而比较的扩大教

育的因子”^[69]。知识精英可以根据观众的知识程度选择放映不同的影片。

20世纪30年代,已有知识精英强调电影深入民众的重要性。周立慈认为相较于在固定场所放映电影,巡回放映更为重要,“必须购备轻便影机,组织巡回团,巡回各乡村,深入民间映放,并加通俗讲演,才能发生很大的效力”^[70]。1936年,中国朝野共同倡导发起了教育电影运动。教育部计划在每省划出两至三个区,每区由一名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专门放映教育电影,放映地点在市镇或乡村的公共场所。影片由教育部提供,其中外国影片包括“科学,公共健康,实业,机械,运动,风景”等内容,国产影片包括“乡村复兴,民族主义,市民训练,以及新生活运动”等内容。^[71]然而,教育电影运动仅在南京、上海、镇江等少数几个城市获得响应。但即使是在上海,亦仅是组织学校中的电影放映活动,计划中准备对广大民众进行的电影放映活动完全没有落实。^[72]这一运动“始终站在都市的教育界,以及都市的文化圈里面,而并没有向着民众主力的农村和工厂中推动”。全面抗战时期,虽有部分省份组织实施了电影巡回放映活动,但无论是放映的覆盖范围,还是电影本身的数量与质量,都难以令人满意。这一时期放映的影片“都是战前制的老片子,如《小玩意》、《小天使》等及抗战前期拍的抗战特辑,少数科学影片,其余就是英美新闻处的宣传影片了”^[73]。这一情况到抗战胜利后依然没有明显改观。

结语

李孝悌在考察清末社会启蒙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并非及身而止,在十年内就倏然消亡;而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走向民众’运动的起点和第一波”^[74]。近代知识精英利用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的历程就是知识精英不断“走向民众”的历程。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创办白话报,不仅意在将知识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更重要的是希望吸引不识字的民众能主动学习识字,进而阅读白话报。但这一设想并未成功,多数民众缺乏学习识字的意愿与时间,文字

造成的知识壁垒依然存在。随着广播与电影的快速发展,知识精英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两种新兴媒介,通过声音或影像绕过文字造成的知识壁垒,直接向全体民众传播知识。到20世纪30年代,知识精英在吸取了此前启蒙教育的经验后,更强调民众学习兴趣的重要性,无论是广播节目还是电影中均试图贯彻“寓教于乐”的方针,以新兴媒介吸引民众产生学习的兴趣。通过上文的考察可以看到,随着各种新兴媒介不断出现,知识精英亦在不断调整其自身的启蒙路径与教育策略。

在近代一些知识精英看来,救亡与启蒙并非对立关系,启蒙的目的恰是为了救亡。一个国家“强弱的原由,不在人民多寡,可就在乎人民有用无用了。民智则有用,民愚则无用,所以有多数智民,国就能强;多数愚民,国就必弱”^[75]。救亡不仅需要团结,更需要人民知识的提升。只有全体人民掌握知识,国家方能真正强大。在救亡的现实压力下,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知识传播的普及与效率。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广大人民实现教育?学校教育或街头演讲显然不是理想的选择,因此媒介在近代的启蒙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实际上,不仅本文主要关注的白话报、广播、电影被知识精英视为启蒙教育的工具,当时几乎一切媒介都在进行教育“转向”。例如清末裘廷梁认为幻灯片“须择天文、舆地、动学、植学及关涉一切格致者,寻常山水游景,仅供娱乐,无所用之”^[76]。

虽然近代中国各种新兴媒介都服务于普及知识这一目标,但媒介特性造成不同媒介进行知识传播的路径并不相同,不同媒介的传播效率亦存在差异。白话报的发行带有较强的地域性,其发行范围主要是省,甚至是更小的某个地区。办报人希望从地区出发,由点及面,由小区域影响局部区域,进而影响全国。有知识精英向民众解释讲报活动时说:“须知道一村人明白,一村人可以为国出力,到处全有热心人出来讲报,各村人都明白了,中国不就有了指望了吗?”^[77]白话报在统一语言方面发挥的作用同

样是由点及面,逐步推进。“欲统一全国语言,不能不对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进以官话;欲悉进以官话,不可无教科书。今即以白话报为教科书,而以省会之人为教师,求材甚易,责效不难。因以统一一省之语言,而后又进而去其各省会微异之音,以驯致全国语言之统一。”^[78]利用电影与广播进行的教育在民国时期通常被合称为电化教育,其效率远在报纸之上,但二者同样存在差异。电影虽然使用全国统一的教育影片,但其无论是固定场所放映,抑或是巡回放映,同样是一个由点及面的传播路径。广播的传播则是由中心向区域发散,在广播网与收音网建设完备的情况下,全国转播统一的节目,各地方广播电台之间通过共享广播稿与唱片,亦能够提供标准化与同质性的节目。全国民众可在同一时间聆听同一节目,其传播效率当在报纸与电影之上。广播对于全国语言的统一更可以收到积极效果。

无论是白话报,还是广播与电影,这些媒介在实际运用于启蒙教育时均面临不能普及的困境。这导致媒介始终未能走入乡村地区和中小城市,因而也始终未能发挥其真正的效力。若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放宽,将研究时段进一步拉长,则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即重视媒介的启蒙教育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介才真正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且在启蒙教育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33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41-142.
- [2]文元书局.劝人看报[J].敝帚千金,1906(12).
- [3]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5.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33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24-125.
- [5]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M].扬州:广陵书社,2008:165.
- [6]汉卿.论白话报[N].竞业旬报,1908-10-11.
-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创办报纸史料(一)[J].历史档案,2000(2):69.
-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晚清创办报纸史料(三)[J].历史档案,2000(4):68.
- [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33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28.
- [10]铁汉.论开通民智[N].竞业旬报,1908-08-11.
- [11]王鸿莉.清末京师阅报社考察——基于空间和族群的视角[J].近代史研究,2020(5):64-80.
-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卷第4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9.
- [13]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J].东方杂志,1905,2(8):165-166.
- [14]林懈.中国白话报发刊词[N].中国白话报,1903(1):3.
- [15]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M].扬州:广陵书社,2008:166.
- [16]善社宣讲白话报[N].鹭江报,1904-11-21.
- [17]梅生.到乡间办白话报的经验[N].民国日报·觉悟,1920-09-09.
- [18]黄卓明.漫谈早期的北平白话报.华北日报,1948-01-22.
- [19]讲报生涯[N].东南日报,1937-04-04.
- [20]汪怡.我们为什么要来广播国语呢[J].国语周刊,1935(192):4.
- [21]Radio Censorship[N].The China Press, July 2, 1936, p.10.
- [22]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98.
- [23]詹行熙.一年来我国之播音教育[J].播音教育月刊,1936,1(1):5.
- [24]王思撰.举办乡村播音教育刍议[J].江苏广播周刊,1937(46-47):45.
- [25]王思撰.举办乡村播音教育刍议[J].江苏广播周刊,1937(46-47):45.
- [26]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J].播音教育月刊,1936,1(1):3.
- [27]杜元载.非常时期之社会教育[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76.
- [28]幼龄.中国需要无线电[N].申报,1933-03-04.

- [29]徐卓呆.无线电播音[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详:3.
- [30]祝星辉.播音教育之检讨[J].播音教育月刊,1937,1(3):2.
- [31]吴道一.发刊词[J].收音期刊,1935,1(1):3.
- [32]怎样利用教育播音(续),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员会代表讲演[N].中央日报,1936-11-04.
- [33]教育播音[N].申报,1935-11-17.
- [34]邱冶新.播音教育的特质及其施行[J].江苏广播周刊,1937(46-47):48.
- [35]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J].播音教育月刊,1936,1(1):4.
- [36]詹行熙.播音教育与复兴民族[J].播音教育月刊,1936,1(2):1.
- [37]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J].播音教育月刊,1936,1(1):1-2.
- [38]家千.广播事业之盛衰[N].申报,1937-03-01.
- [39]范本中.谈播音教育与娱乐[J].湖北民教,1937,1(9):6.
- [40]吴道南.谈谈一般听众的心理[J].江苏广播周刊,1937(46-47):51-52.
- [41]论教育播音[J].广播周报,1936(104):57.
- [42]范本中.谈播音教育与娱乐[J].湖北民教,1937,1(9):5,8.
- [43]朗秋.我所见到的播音教育[J].广播周报,1934(11):36.
- [44]范本中.广播事业在文化上之地位[J].无线电,1937,4(3):204.
- [45]范本中.谈播音教育与娱乐[J].湖北民教,1937,1(9):8-9.
- [46]行政院新闻局.广播事业[M].南京:行政院新闻局,1947:2.
- [47]各省普设收音机及运用办法[Z].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12095.
- [48]吴道一.中广四十年[M].台北:台北出版社,1968:134.
- [49]重庆广播[M].大美电台周报,1946(4):3.
- [50]胡景华.电影与教育[J].民众月刊,1936(2):7-8.
- [51]周钜丰.从电影教育说到战时育教电影到盐村去[J].民教岗位,1938(3):3.
- [52]方治.今后电影事业应有之认识与努力[N].中央日报,1937-05-04.
- [53]周立慈.电影与民众教育[J].昆华民众教育,1933,2(4):1.
- [54]戴公亮.电影在教育上之功能[J].教育与民众,1936,7(8):1449.
- [55]刘之常.电影与教育[J].读书顾问,1934(4):250-251.
- [56]刘之常.电影与教育[J].读书顾问,1934(4):251.
- [57]陈侠任.电影教育与民众教育[J].衢区教育,1937(3):2.
- [58]萧树模.如何发展教育电影[J].电影与播音,1945,4(9-10):217.
- [59]蒋先启.电影与教育[J].中国电影,1941,1(2):28.
- [60]陈婉.电影与民众教育[J].浙江民众教育,1933(6):1-2.
- [61]黄式陵.电影教育·民众教育·教育电影[J].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6,3(2):59.
- [62]Y.电影与教育[J].东方杂志,1920,17(20):79.
- [63]陈婉.电影与民众教育[J].浙江民众教育,1933(6):6.
- [64]Y.电影与教育[J].东方杂志,1920,17(20):79.
- [65]陈侠任.电影教育与民众教育[J].衢区教育,1937(3):2.
- [66]无我.快瞧新电影罢[N].益世白话报,1917-03-29.
- [67]伯宁.电影教育化与电影书本化的探讨[N].申报,1935-04-10.
- [68]倪有祥.电影教育与民众教育[J].民众教育通讯,1934,3(10):18.
- [69]戴公亮.教育电影的本质与特性[J].教育与民众,1936,7(8):1445-1446.
- [70]周立慈.电影与民众教育[J].昆华民众教育,1933,2(4):3.
- [71]教育部举行教育电影运动[J].电影画报,1936(35):3.
- [72]潘公展.电影教育运动的检视[J].教育与民众,1936,7(8):1427.
- [73]黄八我.电影教育的悲哀[J].电影与播音,1947,5(10):255.
- [7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218.
-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第33册)[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40.
- [76]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29.
- [77]王廷栋.爱国讲报社问答[N].京话日报,1906(646):1.
- [78]刘师培.刘申叔遗书补遗[M].扬州:广陵书社,2008:166.